

# 东欧

马少华 著

1989—1993

是动荡，还是崛起？是历史的悲剧，还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规律？在东欧，极权制度已成过去，现实社会主义成了“历史的失败者”，人民挣脱精神桎梏和特权统治，在医治社会主义后遗症中，走上了复兴之路。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 内容提要

1989年,东欧发生剧变。剧变的根本原因是东欧人民已经再也无法忍受原执政集团独享的特权和对人性的压制,无法忍受公有制和中央计划经济造成的经济萧条和长久贫困,无法忍受“一党独裁的专制统治”。在东欧,现实社会主义终于成了历史的失败者。

剧变之后,东欧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转折,曾被东欧原执政团宣传为洪水猛兽的民主、自由和人权被社会广泛认同。为此,东欧各国新生民主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实现了制度顺利转轨,保障了民主、基本人权的自由。

在政治上,东欧各国更改国名,修改宪法,取消共产党的垄断执政权力,摒弃封建——奴隶制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制衡的机制,实行多党的议会民主制度,打击“共产党官僚”,清除“共产主义残余势力”(东欧各国称之为第二次革命),改组军队、警察等武装力量,实现公民平等的政治机会和社会多元化,从而为民主制度和公民社会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在经济上,东欧各国医治了“社会主义后遗症”,包括严重的价格扭曲、恶性通货膨胀、巨额财政赤字、陷于危机的外债等等,实现了内外商贸自由化和价格自由化,促进外资大规模进入和争取到国际援助为制度转轨和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通过全面私有化和鼓励措施发展了私营经济部门。

在对外关系上,东欧各国以人权和经济为基础,从亲东方转向了亲西方。

目前,东欧的经济开始增长,其发展的基础已经具备,它们走上了漫长的复兴之路。

## 自由之风(代序)

本世纪的历史已掀开了重要的一章。一度沉默的广大地区突然发出了呼声和对自由的召唤。1989年秋,正值“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发表200周年,纪念形式宏伟壮观:在短短几个月里,欧洲目睹了攻破巴士底狱,了望塔消失,边界开放的景象,被压抑的热情再度迸发。这些事件正在全世界引起反响,激励人们去思索,去希望,这希望又预示着民主将获得新的成果。

这个历史时刻与二次大战后的初期阶段有着某些相似之处。那时仇恨和耻辱的堡垒被乐观主义的热潮迅速摧毁,未来充满希望和光明。

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的成立就是为了使这一巨大的希望成为事实。教科文组织的使命是动员全世界最优秀的知识界人士,促进全球规模的知识和学术的相互交流,对不可分割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承担集体责任……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这项使命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战争结束后点燃的希望之火很快就熄灭了。人与人之间垒起了新的障壁,自由又有了新的桎梏。殖民主义仍在苟延残喘,给人们带来危险。冷战开始了,由于军备竞赛和局部及区域性紧张局势加剧而不断延续。四十年过去了,那是无数的牺牲、战争和妥协的年代,是尝试开创和失误的年代,是英雄主义和智慧的年代,如今出现了使人回想起1945年的那种局面。

对今天的许多人来说,柏林墙的倒塌象征着希望之火重新点

燃,因为它标志着五大洲在近几十年间对自由、尊严和团结的追求已进入高潮。它标志着一种新的成熟,这是由北南双方的人民付出高昂的代价赢得的,它引导他们去寻求共同的事业而不是战争,寻求独立的国家之间的合作而不是支配者和受支配者之间的权力之争,去寻求作为发挥个人才能和社会发展手段的民主,去寻求作为生活的本质的文化。

强劲的自由之风再度吹起,它激励我们去承担在各地建立民主制度的艰巨任务。这是一项最重要和最紧迫的任务。现在同过去一样,成功的关键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是人、思想和作品的积极交流,是最广泛的知识交流。这一次我们能更接近实现普遍公民权的伟大梦想吗?

这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要充分利用一切机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费德里科·马约尔

## 导 言

东欧是个特定含义的地缘政治概念，六七十年代，我国报刊上指民主德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五国，而更早的时候，则还包括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泛指苏联以外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本书沿用更早时候的说法，通过对各国近几年的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进行分析，以说明东欧复兴的原因和途径。

东欧的变化曾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西方社会曾一致欢呼：“社会主义已经失败，社会主义没有生命力。”是的，现实社会主义正如柏林墙一样。只是无益地浪费人类的劳动，从而筑起了人与人之间的怀疑、隔阂和敌视。1989年某一天，当人们一觉醒来，世界已没有对峙和仇恨，柏林墙垮了。大街上一次次游行、工厂里一次次罢工削弱了共产主义的合法性，计划经济导致的贫困和萧条使东欧的执政者无法吹嘘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人民不放一枪就使政府倒了台！

在1989年下半年，人类度过了最美好的时刻，受压迫者充满喜悦地关注东欧的转变。

1989年之后，东欧踏上了建立民主和实现繁荣的漫长道路，本书主要讲述东欧各国如何在这条道路上前进。

# 目 录

|     |  |       |
|-----|--|-------|
| 代 序 | 自由之风   |       |
| 导 言 |  |       |
| 第一章 | 剧变的制度性理由                                     | (1)   |
| 第二章 | “和平演进”的政治前提                                  | (18)  |
| 第三章 | 民主制度的政治建设                                    | (50)  |
| 第四章 | 通向市场经济之路                                     | (96)  |
| 第五章 | 全面私有化  | (150) |
| 第六章 | 现实利益的国家关系                                    | (183) |
| 第七章 | 政治忧虑与谅解途径                                    | (209) |
| 第八章 | 波兰作为成功者的榜样                                   | (233) |
| 第九章 | 全面改革是复兴的药方                                   | (265) |
| 附录一 | 东欧各国情况简介                                     | (285) |
| 附录二 | 东欧部分重要领导人简介                                  | (301) |
| 附录三 | 东欧国家部分文件选                                    | (312) |
|     | 1、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拉科夫斯基<br>在党的第 11 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       |
|     | 2、罗马尼亚政党和群众组织注册和开展活动法                        |       |
|     | 3、匈牙利社会党竞选纲领(1990. 1. 27)                    |       |
|     | 4、保加利亚关于农田产权和使用权法                            |       |
|     | 5、罗马尼亚自由区制度法                                 |       |

## 第一章 剧变的制度性理由

1989年之后，东欧各国执政集团先后放弃了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放弃了对权力的垄断。拉科夫斯基这位较为开明的波兰统一工人党总理评价道：“西方对1989年底发生在欧洲这一地区的急剧变化没有作好准备。他们感到意外。”不但他们，自己，还有东欧人民都感到意外。剧变的外部原因可以说是东西方关系、资本主义经济状况、不结盟运动等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其外部原因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在于苏联东欧之间的关系。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抱怨戈尔巴乔夫没有干涉东欧的“资本主义复辟”。的确，苏联没有干涉，谢瓦尔德纳泽在1990年7月对此回答说：“我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一项反对这些国家铲除强加于它们的，同它们格格不入的行政命令制度和极权主义政权的任务。”事实上，苏联也无法干涉，仅1970—1990年，苏联用于同西方对抗的军事费用增加了7000亿卢布，用于同中国对抗的军事设施的费用就增加了2000亿卢布。对抗的代价是沉重的。1989年不同于1968年，苏联自身的全面危机已经来到，苏联公民的价值观念已经变化，就连那些悍然阻止“苏联分裂和资本主义复辟”的人也没有得到他们本国人的响应，历时三天的政变之后，他们被送到了“水兵寂静”监狱中。1989年的国际气氛给东欧的变化提供了机会，但变化的根源还是在于东欧的制度本身。

### “特权”与“压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苏联的帮助下，东欧各国先后建立了由少数人垄断一切权力的制度。由于控制了宣传、国家机构、分配社

会财富的权力，再加上渴望共同富裕共产主义的人民的信任，“斯大林主义者”很快地清洗甚至消灭了政治上的异己分子和持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然后，利用他们垄断的教育训练着驯服的臣民。不光荣的夺权历史变成了历史的必然趋势。例如，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 1948 年 5 月议会选举之前所做的调查表明，支持它的选民可怜的少，为了获胜，他们便设法加强了对警察系统的控制和对群众的威胁利诱。鉴于捷共的非民主做法，2 月 20 日，国家社会党、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的 12 名部长集体辞职，抗议在布拉格任命 8 名共产党人为警察局负责人。共产党则引发社会动荡，组织示威游行，强制要求组织以共产党人哥特瓦尔德为首的政府，苏联副外长也赶往布拉格进行威胁，从而迫使贝奈斯总统让位给了哥德瓦尔德。事后的教科书评价 1948 年 2 月事件“标志着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通过和平道路完成了由民族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东欧原执政集团最大的政治失误在于低估人的自然天性，包括追求自由和真诚信念的精神，他们太相信“极权”。“为了控制国家，东欧的执政集团曾许下了太多的诺言，包括真正的自由、人民当家作主、共同富裕的美好生活，但结果却是谎言的世界、普遍的压制、全体普通公民做少数官僚的奴仆以及全体普通公民平均分配贫困，而当权的官僚却过着奢侈的生活。”例如，在 80 年代最后几年，阿尔巴尼亚人均月收入仅有 800 列克（与美元比率为 1：100 到 1：600 不等，不自由兑换），而他们的领袖霍查夫人在法国、意大利均拥有别墅，并经常从国外获得奢侈品，仅有帐可查的霍查夫人挥霍的公款即达 7641 美元（按官方汇率为 76 万多列克）；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更是大量侵吞国家财产，并将大量的国家财产存在国外银行，据为己有。现在的当政者曾否认齐奥塞斯库在外国银行有大量存款，但当美国人在 1992 年底拿出“其在巴塞尔联合银行的秘密帐户只是更换了主人”的证据时，新主人不再



反驳。而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在他统治的这个 900 万人的小国中就有 30 多处别墅，“过着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也无法比拟的奢华生活”，他儿子挪用了数百万美元的公款，其子女将和平旗帜活动中心的财产据为私有。波兰历史学家、前波兰统一工人党活动家塞兹德克指出：“他们（共产党高官）千方百计加以回避一个重要问题是言行不一。嘴上讲的是关于共产主义的道德，但却从不考虑如何使自己言行一致。”波兰《政治周刊》说得更为直截了当：“党讲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

东欧各国原执政集团反复诉说他们代表人民，他们得到了人民的信任。如果说人民相信他们，那肯定不准确。自 1953 年到 1989 年，整个东欧平均每国每两年都有一次针对官僚主义政党的较大规模的反抗或抗议运动。比较大规模的反抗运动包括 1953 年东柏林的 6·17 事件、1956 年 6 月的波兹南工人运动和 10 月的匈牙利人民起义、1968 年的布拉格之春全民运动、1977 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运动以及 1980 年的团结工会运动。在这些反抗中，工人和知识分子几乎每次都要求新闻自由和自由选举。1953 年，东柏林罢工者提出的 12 条要求中，第 1 条是充分保障罢工发言人的人身安全，第 2 条是实行言论和新闻自由，第 5 条是自由选举，第 10 条是释放政治犯；而 1980 年的团结工会运动鉴于执政党不可能同意自由选举，提出的 21 条要求中，第 1 条要求建立自由工会，第 2 条是保证罢工者及辅助人员的罢工权利与安全，第 3 条是新闻、言论自由，第四条是恢复 1970 年和 1976 年罢工之后被解雇者、因信仰而被大学开除者的权利，释放政治犯，取消对非共产主义信仰的镇压。德国之声的一篇评论说：“多少年的反抗，都有一个不变的主题，工人阶级对它们的先锋队怀有深深的恐惧，一边要求权利，一边要求安全。这些经久不息的反抗以及反抗者重复未变的要求至少说明，（东欧）共产党并不象他们吹嘘的那样得民心。”

曾以精英统治的理想而组成的东欧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执政之

后，渐渐地脱离群众，脱离普通党员，变成了家族和多个家族共同谋利的工具，“全体人民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典型的血缘关系系统治网在东欧每一个国家都是现实。以罗马尼亚为例，齐奥塞斯库当政时，整个国家控制在他与他的亲信马尼亚·曼内斯库、埃米尔·博布、图多尔·波尔特尔尼古和扬·丁卡等人编织的血缘网之下，他的弟弟马林、伊利耶、安德鲁察分别担任国家计委副主席、国防部副部长兼军队最高政治委员会书记、内务部高级警官学校校长等职；他的夫人埃列娜担任中央政治执委会党设局任免干部的委员，兼政府第一副总理、国家科委主席等职；他的儿子尼库担任锡比乌县委书记，齐奥塞斯库打算让他接班；其儿媳波利亚娜·克里斯蒂娜担任团中央书记；他的妹夫瓦西里·伯尔布列斯库担任中央主管农业的书记……仅他家的血缘网中就有近百人担任党政部门各种要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是此的国家一清二楚。

1989年12月，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党代会的正式文件指出：“国家的政治结构为前领导人滥用职权提供了方便”，它表现在：(1)权力集中于独裁者手中；(2)对文化、科学和教育实行官僚主义集中管理，导致人才外流；(3)剥夺公民的政治自由；(4)把新闻媒体变成令人作呕的御用工具；(5)党内所有决策过程和志愿的形成都把党的基层组织的排斥在外。党代会表示，有200名高级领导人腐败和滥用职权。慕尼黑《东欧》杂志的编辑评论说：在快下台之前，民德党正式文件搞明白了他们的制度并不是象他们以前宣扬的那样优越，一次就发现惊人的200名腐败的高级领导人，而四十多年来，这种造成腐败的政治结构一直没有根本的改变。

东欧原执政集团建立和维护的这种制度是“没有创造性和排斥基层党员活力的制度，这种制度建构在它垄断一切的基础之上”。

为取得垄断一切的权力，途径是一致的。瓦文萨在反对社会主义的演讲中曾这样描述道：“他们首先取得政治上的垄断权，然后，

剥夺社会成员的财产并收归国有，从而取得经济上的垄断权。”例如，罗马尼亚共产党于1943年6月与其他政党共同组成爱国阵线，1945年3月，共同成立了君主立宪制下的联合政府，依靠苏联的支持与威慑，共产党与其他政党一起废除了君主制，并控制了武装力量，掌握了政治主导权，进而逐步地清除了其他政党的势力，直到最后宣布其他政党不予存在。在经济方面，虽然1948年4月大国民议会通过的宪法规定国家、合作社、个人三种所有制并存，但政府于当年6月将工业、银行、保险公司、矿山和运输业强制收归国有，后来又迅速剥夺了农民的财产，建立了集体农庄和农耕地，从而垄断了国家和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匈牙利共产党与工会和五个民主政党于1944年12月联合组成了匈牙利民族独立阵线，接着成立了临时民族政府，临时政府于1945年3月废除大地主所有制并把土地分给了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在1945年11月的自由选举中，独立小农党取得人民的信任，获得了57%的选票，成为第一大党。只得到17%选票的共产党根本就不甘心，它依靠发动群众运动造成的压力和苏联的支持，迫使独立小农党组成了包括共产党的联合政府。随后，故意损害竞争对手形象的“小农党在内务部有反共和国的秘密组织”案件出现，从而孤立了小农党并使其地方组织完全陷于瘫痪。1948年秋，政府限制了除共产党之外的一切的政党活动。1949年5月，在共产党干部的监督下，匈牙利进行了一党参加的国会选举，组成了一党执政的政府，由一党制定了宪法。随后，通过行政力量，没收了社会成员的一切财产收归国有。到1955年前后，几乎所有的东欧国家都表示已经在人民的支持下建成了以公有制为基础、以共产主义政党为唯一合法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

波兰的《论坛报》说：“合法领导肯定谈不上，他们从来没有得到全民的自愿授权。建设制度时的人民支持更谈不上，历史记录准确地说明，为建立垄断一切的权力，东欧的共产党无论对其本身的

成员还是对普通的公民，都采取了恐怖和不人道的行动。”例如，匈牙利政府在 1949 年将许多怀有理想主义信念、说真话、有正义感和有一些良心的共产党员投入监狱，送上绞刑架，其中甚至包括了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拉伊克·拉斯洛；为了建立公有制，相当多的农民、企业主、手工业者被抄家、吊打、示众、投入监狱，甚至处死；对于完不成或不完成党的农产品义务交售任务的人，政府采取了残酷的惩罚措施，仅 1948—1955 年，就有 20 多万农民因此而被判刑，当时，全国仅有大约 60 万户农民。

东欧国家还剥夺了教会的财产，并强迫神甫学习马列主义课程和宣誓效忠共产党。例如，波兰政府在 1953 年规定所有神职人员必须效忠政府才能担任神职，这项规定激起了神职人员的反抗。同年秋，政府大规模逮捕不服从的主教，甚至包括首席大主教维辛斯基。罗马尼亚设置了宗教局专门管理宗教组织及其活动，成立了官方宗教，并把官方宗教建立成为政府的分支机构，神职人员接受政府的培训，享受政府给予的政治、物资待遇，甚至宣传无神论思想，政府对非官方的宗教组织及其活动采取“无情打击”和“严厉制裁”方式予以惩罚。教徒占全国人口 70% 以上的阿尔巴尼亚甚至到 1967 年已经关闭了所有宗教活动场所，其宪法中明文禁止宗教活动。美联社当时的报道表示：“如果信仰宗教是对美好未来的向往，那么，东欧民众没有向往的权利；如果信仰宗教是对现实世界的逃避，那么，他们连逃避的自由都没有。”

为了加强执政党的权力和防止社会离心倾向，东欧各国采取了民族取消政策。早期的共产党领导人认识到民族主义本身就是对共产主义的否定，因而积极开展反对“民族主义倾向”的运动，哥穆尔卡、胡萨克、铁托等人都被斥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代表人物”，相当多的工人、知识分子因此而被判处徒刑，许多人遭到惨无人道的迫害。后来的领导人采取实用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立场，严格限制少数民族参政，取消学校中的民族史教育，甚至取消了少数

民族语言教育，民族特性被抹杀。

历史学家认为，在东欧各国，“除了违心地对国家领袖歌功颂德的自由，东欧人民丧失了一切自由”。

东欧虔诚的共产主义者曾幻想公民以失去自由的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福利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但却事与愿违。东欧的经济水平、福利水平增长速度都明显落后于世界水平，到80年代，其倒退趋势更为惊人。在教育方面，仅从数量而言（不谈教育水平），也没有值得骄傲的地方。自1965年到1988年，匈牙利20~24岁的青年在高等教育中的入学率由13%变成14.5%，波兰由18%变成19.6%，罗马尼亚则由10%变成9.8%，而与此同时，丹麦由14%变为31%，日本由13%变为30%，联邦德国由11%变为32%，加拿大则由21%变成了62%。

若把“自由”定义为“自由表达和组织示威的权力，以及在自主这个程度上的权利，例如宗教、教育、旅行自由所赋予的权利，以及其他个人的权利”，那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1年得出的指数证明“自由”在居民收入增长、教育水平提高、婴儿死亡率下降等方面起着积极作用。这一研究的结论至少可以否定东欧国家四十年来对社会的信仰、结社、选举、言论、迁徙、出版自由方面的限制具备合理性的论点。

正如哈韦尔所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共产党领导人的特权、压制、腐化成为人所共知、人所共厌的东西，而曾经唤起知识分子热情的意识形态也越来越缺乏说服力。”

### 经济制度的全面弊端

东欧各国所创建的所有制，表现形式上是行政机构所有制。而由于执政党掌握了一切行政机构，所有制的实质又仅仅是党的所有制。东欧原执政党是“世界上典型的实行寡头独裁式组织结构的政党”，其决策“产生于少数的几个人，决定于这几个人，而基层组

织仅仅是他们的控制工具”(利洛夫,1992年1月)。这种组织结构“因为它具有的社会特权而使得名义上的全民财产只能受到实权人物的支配、享用和用于奖励其亲信、得力的追随者”。

全社会财产的政党所有和由此而实行的中央计划经济,一方面把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大的工厂,具体经济单位仅仅是这个工厂的一个车间,从而束缚了具体生产单位积极性和主动精神的发挥,妨碍了公平竞争而导致的资源有效配置,另一方面,政党为了其政治目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长期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特别是服务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把劳动力和资源浪费在钢铁、机械、冶金、化工、军事装备方面,生产了大量低档次的无竞争力产品,而与公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业、轻工业和食品加工工业却投入严重不足,致使市场短缺状况从未得到缓解,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严重失调,产业结构的畸形发展使得整个经济危机四伏。

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东欧各国几乎都把40~45%的国民经济投资用于发展重工业,而同期西方世界却只占10~15%左右。过分重视重工业,造成工业内部比例失调,严重阻碍了轻工业的发展。例如,罗马尼亚的轻重工业占工业的比重分别从1960年的40%和60%变成了1980年的25%和75%,波兰的轻重工业占工业的比重则由1960年的42.5%和57.5%变为1975年的34.7%和65.3%。为造就工业国而使工业高速度地不顾国家承受能力地发展造成了工农业比重严重失调。例如,1960~1980年,保加利亚工农业生产增长比例为7.10:0.72,罗马尼亚为11.60:1.80,民主德国为3.13:0.56,波兰为4.70:0.53,捷克斯洛伐克为2.72:0.72,匈牙利为2.66:0.72。虽然东欧的工业增长速度极快,但其产业构成却并未改善,反而日趋恶化。1984年,匈牙利农业、服务业分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和38%,波兰为15%和33%,而美国为2%和67%,日本为3%和48%。东欧国家劳动生

产率低、技术水平低、成本高,使得产品附加值低。1989年,东欧国家(阿尔巴尼亚除外)制造业附加值每百万时值5000~15000美元不等,例如匈牙利为8724美元;而同年美国为87万美元,日本为83万美元,法国为20万美元。

东欧国家名义上的公有制导致公民产权观念淡化,造成过量开采资源和过度使用设备,从而在耗尽了设备的使用潜力和耗光了可以方便得到的矿产、森林、洁净水、草原、土壤肥力等资源以后,由于劳动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并未提高,因而生产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后劲便没有了。1950~1960年,东欧各国的生产产量呈上升趋势,1960年之后,增长速度大大减缓,到1970年,各国经济已处于停滞状态,有的国家已开始衰退,到1980年,几乎所有的东欧国家的经济都在明显的衰退之中。虽然东欧国家政府公报中的统计数字仍呈上升趋势,但是,各级官僚为表示功绩的粮食产量、物价水平、工业产值往往夸张成份居多。例如,1989年齐奥塞斯库在秋收之后曾宣称该年粮食总产量为6000万吨,而实际上仅有1690万吨。一些西方经济研究机构认为,1981~1987年,东欧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2%左右。

政治领导人好大喜功和寻求合法性支持等原因使得东欧各国一致推行加速发展战略,这些不懂经济的人根据想象而不是从经济的现实条件和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出发,极力追求高速度的发展目标。波兰在70年代初开始执行“国民经济高速发展战略”,70年代中期就“已进入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阶段”。匈牙利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发展指标由原计划的86%提高到200%,其中制造业从计划的104%改为200%,1975年提出了用15~20年时间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奋斗目标。捷克斯洛伐克在50年代就“加快发展速度”,1971年又“朝着发达的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罗马尼亚从1965年到1980年,一直坚持高速度、高投资、高积累的经济发展战略,年积累率在30%以上,总投资每5年

翻一番,1969年,齐奥塞斯库提出了10年内达到或接近西方国家的经济水平的奋斗目标。毫无疑问,奋斗目标无法实现,这些国家越来越穷困,高速度也没有高起来。波兰曾多次降低其五年计划中的目标,即便如此,也有好多次没能实现降低后的指标;罗马尼亚一直是公认的越来越贫困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在60年代初期,就已严重恶化,1963年,官方公布的国民收入比上年下降2%。

东欧国家经济体制的弊端至少自1953年开始就被其领导人所认识。这年7月,纳吉·伊姆雷总理在匈牙利国民议会坦率地承认,庞大的五年计划指标超出了国民经济的承受力,僵化的经济体制造成了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他表示要放慢工业发展速度,发展轻工业;在农村,强调自愿入社,允许小私有企业合法化。1956年波兰波兹南事件后,哥穆尔卡进行了改革,例如精简机构,把中央38个部减为25个,下放权力给省、市、县;增加农业投入,减轻农民负担,解散违反自愿原则建立起来的合作社;扩大企业权限;指令性指标由几十项减为8项;扩大工人、农民的权力和地方的自治权力等等。60年代,日夫科夫就指出:“共产党管了许多自己不该管的事。”他在1968年保共中央七月全会上就指出,党政不分造成了机构重叠、浪费和党直接干预一切。他进而规定,党政职能权限应明确划分。1968年,在杜布切克领导之下,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全面、具体、深刻,其内容包括:(1)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取消指令性计划指标,建设有指导的市场经济;(2)改善党的领导,清除官僚主义,党不再作社会的“总管家”,实行党政分开,扩大吸收知识分子入党,使党员知识分子参加政治决策过程;(3)改革国家机构,划分职权,建立监督制度,防止整个国家机构的权力集中于某一环节、某一机关或某一个人手中;(4)实行社会公正和民族公正,提倡文化自由,强调艺术创作不受官僚干预、不受检查,允许文化事业单位实行合作经营和个体经营;(5)建设开放性的民族阵线,使民族



阵线成为政治多元化的雏形，一切重大决定和人事安排，应按民主原则通过讨论和秘密投票来决定，一个政党不能垄断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应允许多党制存在，以对权力实行分散和监督，取消新闻检查，切实保障言论、结社、集会的自由；(6)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限制兼职，促使干部队伍年轻化；(7)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主张在国际共运中应存在多种社会主义模式等等。

改革就是承认过去做得不对。但是，早期和中期的这种改革无一例外地没有进行下去，保加利亚和波兰很快退回到原来的道路；匈牙利反对改革的人把纳吉送上了断头台，并在莫斯科的帮助下改组了党，重新组织了政权和军队，惩罚了所有支持改革路线的人；杜布切克的带给公民们希望的改革运动也遭到了莫斯科与本国反改革势力共同镇压的命运；古斯塔夫·胡萨克把一整套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重新建立起来了。

只是到了苏联、东欧各国全部都病入膏肓的时候，改革才重新在各国先后提上日程。但是，既得利益的官僚仍要竭力维护其权力的基础，顽固地要求公有制的比例和一党的既得政治地位。正是造成国家和社会灾难的东西反而保存，社会主义无法自我完善，改革在各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东欧国家四十年来的历史特征表现了政治利益的共同性和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与莫斯科公开决裂，波、匈、捷、保、罗和民主德国却一直安然作为莫斯科的卫星国。社会主义模式在东欧呈现了多种多样的形态。匈牙利自1968年就已持续地进行改革，波兰自1982年，捷克斯洛伐克自1987年也扩大了企业的权利，借鉴了资本主义的一些经济措施，并使党对社会的控制有所减弱。南斯拉夫早在50年代就实行工人自治和社会所有制。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一再否认社会主义制度有改革的必要，他坚持只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进行政治、文化、技术和经济的交流与合作。阿尔巴尼亚甚至连“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合作也不